

孙关龙 年鉴论集

孙关龙◎著

年鉴是以编年体书写的按年度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

年鉴不是资料长编，而是年度性的新的有价值的信息荟萃，它一要新，二要精，三要实。

一级一级的若干个台阶构成了楼梯，一年一部年鉴恰似一级台阶，一部志书就恰似由若干个台阶构成，才称之为楼梯。

孙

关

龙

年

鉴

论

集

中国林业出版社

孙关龙年鉴论集

孙关龙 著

中国林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关龙年鉴论集 / 孙关龙著.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038-8133-6

I. ①孙… II. ①孙… III. ①年鉴—编辑工作—文集 IV. ①G23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0578 号

策 划: 邵权熙

责任编辑: 易婷婷 张衍辉

出版: 中国林业出版社

(100009 北京西城区德内大街刘海胡同 7 号)

网址: <http://lycb.forestry.gov.cn/>

电话: (010)83143521

发行: 中国林业出版社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25.25

字数: 415 千字

定价: 68.00 元

前 言

回顾 1996 ~ 2013 年担任中国年鉴研究会(2001 年改制为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十七年(其中 2002 ~ 2010 年兼任研究会副会长),工作是愉快的。研究会领导都不脱产、不取分文报酬地勤恳工作,虽分散在天南海北,却能较为有效地运转,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年鉴事业尤其是中国年鉴的学术事业的发展。

在出版我论文集之时,我衷心地感谢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对我的厚爱,决定出版我的这本论文集;衷心地感谢研究会现任会长许家康、老会长尚丁对我和学术委员会工作的全力支持;衷心地感谢全国年鉴同仁对我和学术委员会工作的大力支持,尤其感谢先后承办第六至第十三届全国年鉴学术年会的《山东年鉴》《湖南年鉴》《温州年鉴》《湖北年鉴》《苏州年鉴》《杭州年鉴》《深圳年鉴》社的同仁;衷心地感谢历届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更要感谢先后与我共同主持学术委员会、《年鉴论坛》工作的刘菊兰、苏伯华、马惠平和研究会现任秘书长王璠对我工作的鼎力相助。也要感谢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林业出版社的邵权熙副总编和本书责任编辑张衍辉、易婷婷。

文集分为 3 部分:①在第六至第十三届全国年鉴学术年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8 篇);②在第一至第十三期全国年鉴编辑高级研讨班上的讲稿(7 篇);③应邀在中央级年鉴和地方各年鉴培训班(研讨班)上的讲稿(10 篇)。由于时间关系,也为了避免重复,我应邀在《中国妇女研究年鉴》《中国机械年鉴》《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年鉴》《中国水利水电年鉴》《中国林业年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年鉴》《中央电视台年鉴》和中国铁路系统年

鉴、浙江省年鉴、北京市年鉴等培训班上的讲稿，没有整理收录。

文集收录的 25 篇拙文，时间跨度是 1997 ~ 2013 年，这是历史的足迹。因此，我在整理工作中以维持原貌为准，多数仅有文字上改动，有两文在内容上有增删，已在书内注明。

最后，恳盼年鉴界同仁给予批评指教。



2013 年 12 月初稿

2015 年 9 月定稿

目 录

第一部分 全国年鉴学术年会主题报告

- 当前年鉴理论研究和编纂工作中存在的几个重要问题 /3
- 铸造中国年鉴事业的第二次辉煌 /15
- 思想理论创新是年鉴创新的关键 /24
- 加强改革创新力度 开创中国年鉴事业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39
-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年鉴的创新事业 /53
- 铸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及其年鉴学 /64
- 年鉴创新的又一次检阅 /83
- 中国年鉴 35 年奇迹史的重要动力 /107

第二部分 高级研讨班上讲稿

- 创新, 21 世纪中国年鉴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131
- 编校质量和年鉴创新 /144
- 重论年鉴体 /163
- 从年鉴评奖看年鉴创新和编校质量 /177
- 中国年鉴的现状 & 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93
- 年鉴与地方志的比较研究 /217
- 方志不能年鉴化 年鉴不能方志化 /240

第三部分 各地的讲稿

如何撰写年鉴论文 /263

初探中外年鉴的历史 /269

年鉴大纲的设计原则和方法 /298

提高年鉴条目质量是年鉴创新的当务之急 /308

年鉴的性质和特点 /317

年鉴和方志要着力编制好主题索引 /329

年鉴撰稿十忌、十要 /349

年鉴编纂从体例开始 /360

中国年鉴需要打造精品、培育名鉴 /368

图片，年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375

索 引 /386

第一部分

全国年鉴学术年会主题报告

当前年鉴理论研究和编纂工作中 存在的几个重要问题*

——在第六届全国年鉴学术年会上的主题报告

(山东济南, 1997 年 10 月)

1980 年以来, 我国年鉴事业空前地繁荣。年鉴数量由 6 种猛增到 1300 多种^[1], 其中涌现出一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年鉴; 撰写出了一批好的和比较好的论文、文章, 出版了多部著作; 并成功地举办了 6 届全国年鉴学术年会、2 届全国年鉴优秀论著评奖活动。短短 10 多年中, 中国的年鉴事业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果, 这在世界年鉴发展史上是不多见的。年鉴已成为中国文化百花园地中的一株有着旺盛生命力的新葩。同时,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年鉴事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无论是在年鉴的编纂工作中还是年鉴的理论研究中, 都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下面作者就几个重要的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的意见, 供年鉴界的同仁参考, 也恳请年鉴界的同仁给予批评、指教。

一、关于年鉴的性质

年鉴的性质, 这是一个涉及年鉴编纂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中带有根本性指导意义的问题。对这个问题, 年鉴界已探讨和研究了 10 多年的时间, 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 至今存在不少模糊和片面的认识, 其中在目前较为流行的一个观点, 认为年鉴属于历史性质的书籍。例如, 有的同志说: “地方性年鉴与地方志同为史书”^[2]; 有人说: “地方志和地方年鉴都是地方性史料书”^[3]; 还有的同志说: “年鉴如同方志一样, 是历史的一个分支”, “年鉴, 特别是地方综合性年鉴, 它是该地区的一部史书, 是忠实记载上年度该地区各方面主要活动的正史、实录”^[4]等。

首先, 地方志不同于地方史。地方志是否属于“史书”, 已争论几百年,

* 曾载《年鉴通讯》1998 年第 2~3 期(全文), 《年鉴信息与研究》1998 年第 1 期(部分)。

至今还在争论。但方志的早期形式“地记”“图经”等都不属于历史，而属于地理门类，却是被公认的，所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中说：“方志的传统分类法属于地理门”^[5]。作者一直认为，地方志源于地理，发展于历史，现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综合性学科门类^[6]，方志书籍也成了独立的一大类图书——志书。作者的观点为方志界的权威人士讨论所认同，写进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7]。

下面我们着重讨论本部分主题——年鉴的性质。年鉴是什么？中外学术界一致认为：年鉴是以编年体书写的按年度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是这样说的^[8,9]，《美国百科全书》也是这样说的^[10]，《辞海》^[11]《出版词典》^[12]《图书情报词典》^[13]等都是这样说的。可见，年鉴与方志是两种性质很不同的文化载体。①年鉴是工具书；方志，按各种不同的观点，无论是归入地理书、史书、“官书”，还是成为独立的一大类志书，都不是工具书。②年鉴是按编年体撰写的；方志采用的主要不是编年体，而是记事本末体。③年鉴是按年出版的，所以又有“年刊”之称；方志不是，它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按年出版。

可见，年鉴定义中的4个要素有3种要素与地方志截然不同，仅在资料性上与地方志有所相通。其他还有许多不同，例如年鉴主要的编纂形式是条目体，方志无论是章节体，还是纲目体，以及门纲体、卷目体，都是文章体。当然，地方性年鉴与地方志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例如都带有文献资料性，都要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等。但是，这些相似之处不应影响、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影响它们性质上的原则差异。

由于对年鉴性质上认识的失误，误把年鉴与方志捆绑为一类图书，又不恰当地归入史书，导致对年鉴功能的错误理解（详见第二部分），不去强调年鉴要在“新”字上下工夫，要充分反映时代的脉搏，体现社会发展的主流，很好地为现实服务、为读者服务。这样，怎么可能编纂出富有时代气息的年鉴呢？怎么可能使年鉴常编常新呢？以致有的同志在上述错误认识的指导下，提出楼梯说：年鉴与志书“两者似如‘台阶’与‘楼梯’：一级一级的若干个台阶构成了楼梯；一年一部年鉴恰似一级台阶，一部志书就恰似由若干个台阶构成才称之为楼梯。因此，年鉴是志书修志前积累的‘资料长编’、资料基础，志书则是年鉴的浓缩本，是高度的提炼”^[14]。在年鉴是“资料长编”思想影响下，年鉴越编越大，越编越全；进而又不适当地把在地方志编纂工作中也难以完全做到的“纵不断线、横不断项”用来要求年鉴^{[3]102}。结果不少年鉴动辄便是百万言，面面俱到，行行不缺，线线不断，然而广大读者要查检的有价

值的信息却寥若晨星。应当明确,年鉴不是“资料长编”,而是年度性的新的有价值的信息的荟萃,它一要“新”,二要“精”,三要“实”。在年鉴编纂工作中,必须做好资料的广泛收集,力争要全,但收集的资料是不可能全部上书的,而是应该做一番除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从中选择新的、大的、特别的又有实用价值的资料上书。如果我们的资料工作做得好,收集资料十分广泛、丰富,从中选择几十分之一或几百分之一的资料上书,那么这样的年鉴质量一般会是上乘的。而且,年鉴是年度性的,不可能在本年度中每行每业每个部门的新事、特事、大事、要事都不断线、不缺项,而必须根据当地当年的实际情况加以记载。当年当地新、特、大、要事确没有断项,就按“横不断项”写;不少方面断了项,就按断了项写。当年当地许多方面的新、特、大、要事确没有断线,就按“纵不断线”写;如果更多的方面断了线,就按断了线写。

顺便说一下,年鉴编纂工作当前面临一个如何消肿、减肥的问题。目前,我国图书编纂工作中普遍存在着一个“贪大贪全”的问题,我们年鉴界似也不例外。而且,在年鉴是史书、具有存史功能和“资料长编”等思想指导下,年鉴编纂工作中的“贪大贪全”的倾向有进一步发展之势。编年鉴,确实要考虑“全”,事无巨细的“全”,但应该是高度概括的全,新事、大事的全,特事、要事的全,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全”,“大而全”的“全”。在“新”与“全”、或“特”与“全”、或“大”与“全”、或“要”与“全”的矛盾中,主导方面应是“新”“特”“大”“要”,即“全”要服从“新”“特”“大”“要”,年鉴所选收的全,应是新事、特色事、大事、要事的全,不是新、特、大、要事不收。现在年鉴中,尤其是地方性年鉴中因为求“全”,而让“全”掩盖了“新”、埋没了“特”的现象,是较为普遍的。

二、关于年鉴的功能

对年鉴性质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一些同志对年鉴功能认识上的误区。例如,有的同志说:“一般说来,‘存史、资治、教育’是地方性年鉴和地方志的共同功能,它们的价值都在于提供资料,这是共同的根本功能”^{[2]262}。有的人一方面承认年鉴的工具书性质,却又把地方志的3个功能套用到年鉴上,说:“年鉴是……连年出版给广大读者提供新信息、新知识的资料工具书……功能是‘资政、教化、存史’”^{[14]6}。年鉴作为工具书,其首要功能是服务现实、供人查检、解惑答疑,这是一切工具书的共同功能,亦是与主要供人系统阅读

的地方志在功能上的最大区别。供人查检是年鉴的核心功能。至于“存史”功能，年鉴因为是按年度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所以是确实具有的，但它与服务现实功能相比毕竟是第二位的，而且是一个外延性功能。所谓外延性功能，是说年鉴只有反映现实正确、及时，为现实服务好了，才具有存史价值。若是相反，则是不具有存史价值的。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工具书热”和“年鉴热”；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中国大地出现“年鉴热”“工具书热”，都主要是信息时代人们迫切需要查检的结果。

在工具书这个大家庭中，年鉴与其他工具书最大的区别，或说其最大优势是“按年度连续出版”，即年度性。因此，年鉴是工具书大家族中最能及时收录新学科、新技术、新观点、新理论、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新手段、新事物、新情况、新发展、新特点、新道德、新风尚、新困难、新问题的工具书。突出一个“新”字，是年鉴内容的最大特色。然而，现在不少年鉴在年鉴是“史书”，功能是“存史”等观点的误导下，忽视年鉴的现实性功能、检索性功能，“新”字不突出的状况非同一般。具体表现如下。

1. 新情况有重大缺漏。例如，现在全国流动人口约 8000 万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流动人口肯定还要增加，增加到 2 亿或 2.5 亿流动人口在未来二三十年是可能的。流动人口问题存在至少已有 10 多年了，而且各省市流进流出的人数都不少，可是作者查阅了 10 多部 1996 年和 1997 年省级年鉴和城市年鉴，没有一部反映流动人口的情况和问题。又如，我国下岗工人已有约 2000 万人，把其家属加上，人口接近 1 亿，这么大的群体，并涉及安定团结的大问题，在我查阅的 10 多部 1996 年和 1997 年省级年鉴与城市年鉴中亦没有反映。再如，“抓大放小”是 1993 年 11 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已明确提出的重要方针，已实施多年，多数年鉴至今也没有反映等。我们的年鉴不去强调“新”，不是常编常新，而是年年雷同，卷卷一面，读者就会减少，社会效果便会降低，年鉴就会逐渐丧失生命力。尤其是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变时期，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时期，每省、市、县每年都在发生显著变化，不注重“新”，怎么能够提高年鉴的质量，很好地为现实服务，为读者服务呢？

2. 贪大贪全。这个问题前面已说了，此处再补充几句。我们不能为了“存史”的目的，把年鉴的资料搞得全上加全，我们只能考虑为了满足读者的查检需要，把那些新事、特事、大事、要事收全，即要把检索率高的事选收入书，那些检索率低的，以至于无检索率的死条、半死条，则是不应该收录

的。现在不少年鉴收入了大量日常工作的情况,其检索率是很低的。确切说,收录大量日常工作情况不是年鉴这一类资料性工具书的任务,而对资料性的志书却是有重要价值的。讲究质量的年鉴应该从“大而全”中解放出来,去求新、求精、求特(即有特色)。

3. 忽视检索系统。或由于把年鉴误认为“史书”,或因为不太懂得什么是工具书,或由于习惯势力,年鉴界存在着忽视检索系统的倾向。1994年一篇文章统计说,除了分类目录外,有别的检索渠道的年鉴仅占10%~15%^[3]¹⁶²;1996年年底的一篇文章说,70%以上的年鉴只有分类目录,没有其他检索渠道^[15]。我听北京大学肖东发、中国社会科学院李今山等教授说,检索系统问题过去也多次讲过,但是一个顽症,一直改进不大,一些人还错误地认为这是“多余”“没事找事”。

一本工具书,有否多种、便捷、易查的检索渠道是质量高下的重要标志。工具书是供人查检用的,检索渠道就是人们入门的向导。没有检索渠道是无法使人进入工具书之门的,单一的检索渠道是无法使人简便快速地进入工具书大门的。一本高质量的工具书,应该具有多种检索渠道,做到“路路通”“条条大路通大典”。中国历史上,历来不重视标点符号、检索系统,这两者都是20世纪初之后才传进中国。《中国大百科全书》开创了中国工具书设立检索系统的先例,每一卷书不但有分类目录,还有音序检索渠道、笔画索引、外文索引、彩图索引、内容分析索引等10种检索手段^[16],形成路路通检索渠道,做到了“上天有梯,入地有门”。索引在国外,已发展建立为一门学问——索引学。为方便读者,增加知识量、信息量,国外许多普通的书都已附有多种索引;《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内容分析索引也仅是简式的,国外已有多种形式的复式索引。一部年鉴仅有好的内容是不够的,还要有完备易查的检索手段,不然等于请人过河不给船只或不搭桥梁,再好的内容也发挥不了作用。当然,年鉴的检索系统较为难做,其难度比百科全书大。但是,我们的同志真正认识到了年鉴是工具书,就会自觉自愿地去克服困难,为广大读者铺路架桥。

4. 忽视动态性。年鉴的“新”是动态的新,每年情况不同,新的内容亦不同。因此,必须跟随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现在有的文章和书籍过于强调年鉴条目资料的完整性并不可取。例如,有的同志说:年鉴条目是“本年度某一领域或学科,一个独立主题的完整信息资料或知识的概述”,所以进而提出:“条目的年度性要从资料的完整性出发,将‘完整性’体现出来”“反映事物的来龙去脉”^[14]^{15~17}。首先,年鉴的条目是不是“独立主题”,是值得商榷

的。年鉴条目一般只反映年度内的情况，常常限于某一事物在一年内发展的片段，因此很难构成独立的主题。第二，要求每个年鉴条目写明“来龙去脉”，并要求“从资料的完整性出发，将‘完整性’体现出来”，似有些脱离实际，因为大量的条目主题是跨年度的。前面说了，年鉴条目主要采用编年体撰写，而不是记事本末体，用编年体撰写是很难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交代清楚的。另外，要求从完整性出发，将完整性体现出来的说法欠恰当，似应将“完整性”改为“整体性”。也就是说，即使大量年鉴条目只反映某事物在本年度发展的片段，亦应尽可能地从事物的整体性出发，将整体性尽可能地体现出来。这里讲了两个“尽可能”，客观实际也只能是这样。

动态性，是年鉴区别于其他工具书的重要特性。这个特性要求我们的每一本年鉴每年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一些新的栏目，同时淘汰一些旧的原有栏目。国外高质量的年鉴每年都要更新一批栏目，少的年份也占5%左右的栏目。所以它们能做到常编常新，跟上时代和形势的发展。我国年鉴界对年鉴动态性的特点重视不够，过于强调稳定，过于求“全”，加上年鉴是“史书”“资料长篇”，功能是“存史”等观点的影响，很多年鉴的栏目都是一定几年不变，有的近10年了也没有什么变化。如何突出年鉴“新颖性”的特色，体现年鉴是最讲究“新”字的工具书，把为现实服务、为读者服务放在第一位，客观公正地反映现实，常编常新，使我们的每一本年鉴都能编出有实践基础的新意，是需要我们深入探讨和实践的。

三、关于年鉴的多样性

年鉴的多样性问题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年鉴种类的多样性，这个问题应该说10多年来发展不错，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出版的年鉴已能如此多样，已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因此，本文不打算研讨这个问题。二是不同年鉴如何突出不同的特色，各自拥有不同的风格，此问题本文拟作一个粗略的探讨。

看了这次参与评奖的100多篇论文和文章及若干著作，读了递交本届学术年会的100多篇论文和文章，我感到我们年鉴界对规范化问题强调得不错，成果也不少，包括出版了李今山教授等编写的书籍《中国年鉴编纂规范化》。相比之下，不同的年鉴应该具有不同的特色和风格，似强调不够，在我阅看这次参评、参会的280多篇论文和文章，专门探讨不同年鉴应该具有不同特色和风格的论文(文章)很少，仅有5篇，占不到参评和参会总论文数的2%。

其中参评的文章有4篇,仅有1篇文章获奖,即长江年鉴社钟小珍社长的《试论专业年鉴的特色》论文,获二等奖。说明对特色性问题的探讨,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均是很不够的。实际上,一部年鉴能否办出自己的特色,是否具有独特的风格,是其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

年鉴大的类别有人分为两大类,综合性年鉴和专业性年鉴;我认为应分为三大类:综合性年鉴、专业性年鉴和地方性年鉴(详细理由以后再述)。在综合性年鉴中,又有学术性综合年鉴(例如《中国百科年鉴》)和普及性综合年鉴(例如《世界知识年鉴》)之分,后者还包括国外有的《中学生年鉴》《小学生年鉴》等。在专业性年鉴中,又可分为学科性年鉴(例如《中国哲学年鉴》)、行业性年鉴(例如《中国出版年鉴》)、专题性年鉴(例如《客家年鉴》)、企业年鉴(例如《鞍钢年鉴》)等。在地方性年鉴中,有地方性综合年鉴、地方性专业年鉴;地方性综合年鉴中又分大地域(超过一个国家的地域)年鉴(例如《中东年鉴》)、国别年鉴(例如《中国年鉴》)、省级年鉴(例如《黑龙江年鉴》《北京年鉴》《广西年鉴》)、城市年鉴(例如《广州年鉴》《成都年鉴》《西安年鉴》)、县级年鉴(例如《武进年鉴》《兴城年鉴》)、流域性年鉴(例如《长江年鉴》)等。不同类型的年鉴应该有不同特点和风格,例如《中国百科年鉴》其特色是反映各学科和领域在世界和中国重要学术进展,这是其他年鉴无可比拟的。如果《中国百科年鉴》重点去反映中国的一般概况,就混同了《中国年鉴》,抹杀了自己的特色。又如,地域性综合年鉴首要的是要有地域性特色,地域性综合与《中国百科年鉴》的学术性综合或知识性综合是完全不相同的,所以不能套用《中国百科年鉴》的模子来编纂地域性年鉴。不同地域的地域性综合年鉴特色也是不同的,就是同属岭南的相互邻近的《广东年鉴》和《广西年鉴》虽然都姓“广”,但两省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人口、民族、民俗等都有极大的差异,各具特色,它们的栏目可以相互参考、借鉴,但是一定不要不加分析地套用。倘若《广东年鉴》没有广味、《陕西年鉴》没有陕味、《西藏年鉴》没有藏味、《上海年鉴》没有海味、《北京年鉴》没有京味等,读者是不会欢迎的。地域性年鉴现在富有地方特色的栏目太少了,尤其是较高层次的栏目;百鉴一面的雷同现象十分严重。再如,《郑州铁路局年鉴》性质应是行业性的地域性年鉴。《郑州铁路局年鉴》首要的应该具有行业特点,即铁路行业的地方特色;同时,应该具有郑州铁路局的地方特色。没有“铁”色不行,不成为《郑州铁路局年鉴》;没有“郑”色也不行,也成不了《郑州铁路局年鉴》。而且,《郑州铁路局年鉴》的地域性特色主要是线性的,与《河南年鉴》《郑州年

鉴》的块状或面状地域性特色也是很不相同的。现在地域性的铁路年鉴，在其栏目上能见到线状地域性特点的亦不是很多。

这里涉及年鉴规范化的问题。年鉴要不要规范化？回答是应该肯定的，需要规范化。没有规范化，就不会有年鉴。而且，应当说目前的规范化是远远不够的，仅是初级的规范化，以后要向高级的规范化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应该明确两点：①规范化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每部年鉴如何富有特色、各具独特的风格，更好地为读者、为现实服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年鉴的规范化应服务于年鉴的特色化和风格化，促进这方面工作，而不是阻碍。②规范化工作不能是单一的机械的规范，即不顾实际情况强求不同性质的年鉴实行机械的规范，结果“一刀切”，切掉了年鉴的多样性、特色化。而应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多样性的规范，做到“统而不死，活而不乱”。

四、关于加强市场意识问题

党的十五大在上个月胜利地召开了。当前，我们面临一个国家少有的大好形势，同时又面临一个竞争进一步加剧的局面。年鉴界如何适应当前转型社会的需要，跟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这几年做了不少有价值的探讨。一些同志提出的“背靠政府，面向市场”的设想和做法是很对的。政府这一头，能靠的一定要靠，要千方百计地靠；但是，年鉴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文化商品，根本出路是面向市场。在不少地方和部门，年鉴工作得到了当地和本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包括经济上拨款、政策上支持等，这是很重要的，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则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作者认为年鉴与政府在经济等方面的脱钩，是迟早的问题。在这里我列举两个事例。

一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它已被列为国家“九五”出版规划第一号项目，也是我国跨世纪的天字第一号文化工程。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它成为代表21世纪初的中国科学文化国家水平的新的综合性百科全书。为此，我们多次申请国家全额拨款，国家新闻出版署也一再为我们说话，但国务院领导同志明确指示，在经济上第二版不能像第一版那样采取国家全包下来办法（后来仅批准拨给少量的编辑费用），你们要面向市场。而且说，第三版时经济上你们要完全独立，与国家脱钩。

二是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截至1997年6月底，国有企业职工较去年同期减少127万人，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35万人，比减少的多8万人，即国家的负担净增了8万多人。目前，我国国家